一部颇具新意的拓荒之作

简评《恭亲王奕䜣大传》

孙　克　复

恭亲王奕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关键性人物，也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从1853年到1898年活跃在政治舞台达四十余年之久，先后以议政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断续执政三十一年，声势显赫，权倾举朝。中间虽经过几次宦海沉浮，但在晚清同治、光绪两朝，他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左右全局的人物，对于晚清政局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史学界还不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清末到民国时期，仅个别学者为他写过简短的传略。解放以后，有的史家从研究洋务运动的角度涉及过他；也有的学者从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辛酉政变过程中，对他有所评论。由于论者研究的角度不同，难免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甚至有所偏颇而欠公允。董守义同志所著《恭亲王奕䜣大传》一书，征引了翔实的史料，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奕䜣的思想性格、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的政治活动，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行了认真求实的探讨，撰写了四十余万言内容丰富的奕䜣大传。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拓荒之作，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是一项可喜的新成果。我阅读之后，受到很大教益。

研究历史最忌原地踏步，贵在推陈出新。推陈出新的关键是选取新的观察角度，确定新的价值标准。

奕䜣，已往史学界一直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在中央的总代表，称他所代表的势力为洋务派中“奕䜣集团”。但对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却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近年来，史学界不少同志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的继续深入和发展。而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器物近代化、制度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三个层次。其中的器物近代化阶段，正是史学界所说的洋务运动阶段，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初起步。

《恭亲王奕䜣大传》作者从这个新的价值标准和观察角度出发，提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及奕䜣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命题，全书紧紧围绕这一命题为中心，来撰写奕䜣的生平传记，这是奕䜣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也是本书最突出的学术意义。

当前，尽管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历史地位等等的评价，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而且这种分歧和争论也许还要继续相当时间，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生产力标准的认识出发，逐步肯定了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造就和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开通了社会风气，实现了从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起步等一系列事实；承认它自觉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生产关系的历史作用。本书作者把恭亲王奕䜣提到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的高度，正是以生产力标准对他做出的新评价，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的推陈出新，是颇有价值的学术探讨。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重要原则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力避英雄史观，也要力避形而

上学。例如写正面人物就极力从其少年时代寻找英雄品格；写反面人物就力图论证从幼年时就是一恶少年等等。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存在“人之初”的“性本善”和“性本恶”问题。本书作者正是遵循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撰写奕䜣的生平。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奕䜣代表清政府鉴订了屈辱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成为妥协派的代表。但奕䜣绝非生来就是一个妥协派，因此，作者如实地写出他在1858年曾经是主战派的一员，主张驳斥英法的侵略要求，反对廷臣中的空言，呼吁充实御海兵力。甚至主张密谕两广总督黄宗汉督练兵勇，相机驱逐英法侵略者出广州以及赞同于京通运河泄水沉船，以防英法联军内犯。还坚决反对1858年天津条约中关于长江通商口岸的开放等等。奕䜣的上述抵抗意识和主张，并不是说他自觉地与人民站在一起英勇地抗击侵略，而是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紫禁城内与世隔绝的皇子生活形成的“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和盲目排外思想，构成了主战意识的基础。大清皇帝的“龙子龙孙”，自然不会把海陬小邦的几个红毛鬼子兵放在眼里的。他的“扫除氛祲奠皇州”的豪言壮语，正是这种盲目虚骄思想的流露。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残酷事实，无情地击碎了他“扫除氛祲”的迷梦。清军的大溃败，守城王大臣的腐朽，英法联军的狡悍残暴以及对天津、北京，尤其是圆明园的浩劫，终于促使他主战意识彻底破灭，为妥协投降作出了逻辑安排。大传的前三章，作者紧密依靠社会环境，细致地描绘了传主的上述思想演变过程。既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论原理，自然也就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具有说服力，令人可信。

作为社会中生活的人的性格往往是多元的，人们的活动和行为也是多侧面和丰富多采的。作者在本书《开头的话》中提出，要写好人物的多元性格和立体的行为，这是十分可取的。的确，“生活中的人是多侧面的，怎么能一言以蔽之曰：好或坏”！那种把历史人物加以脸谱化的简单作法是不可取的。

作者在大传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奕䜣倡导近代化的一生，突出了传主的生平主要事迹，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奕䜣，又是一位丰富多采的多元化性格和立体化行为的人物。他的性格既傲岸又谦卑；既坚强又妥协；既诚恳又狡谲；既热情又冷酷；既信任又多疑；既宽宏又猜忌；既果敢又寡断，等等。这位皇族出身的贵胄，既是旧势力的维护者，又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对祖国怀有深深的忧患，却又肆无忌惮地出卖主权；他竭力扶持清王朝这座即将倾圮的大厦，却又在瓦解和破坏它的根基；他呼吁“自强”，倡导近代化运动，却又叫喊“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革新；他精通中华传统文化，但也提倡学习西洋之长技，等等。

写出人物多元化的性格和立体化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运用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僵化。一件事情可以引出几个结果，一个人物可能有几付嘴脸。即如奕䜣，1860年北京的失陷，使他从主战派转为妥协派的关键，同时也是他成为洋务派的开端，他正是从此开始倡导和实行近代化的。这样，在他妥协面孔的背面，就有着一副卧薪尝胆的不屈服的另一面。再如，奕䜣作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一员，却热爱并精通传统的中华文化，这使他赢得了朝野广大汉族士大夫的尊敬和信赖，甚至连号称清流领袖而极力反对洋务的翁同和、李鸿藻等也不例外。因此，奕䜣成了戊戌变法之前的各派政治势力互相倾轧局面下的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又从根本上制约了他的近代化改革的构想与实践。台湾学者黄大纲先生说得对：“奕䜣等人是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带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所可惜的，他们也出身于旧社会，只受到旧式教育，单凭和外人接触的结果，只注意到皮毛的改革，而没有统筹全局，求全盘的维新”。又如，当奕䜣在声势煊赫

的议政王时期，在推行近代化运动中，头脑敏锐，敢作敢为，对于曾、左、李等人的洋务活动，发生了启导和推动作用。在一个时期里，他对于轮船、铁路、电报以及派遣驻外使臣等问题，较之曾、左、李等人更有迫切感。而在他受打击挫折之后，就变得因循苟且了，他面临的阻力愈多，改革的勇气也就变得愈小，以至后来李鸿章要求建筑铁路时，竟冷漠地表示对这件大事，“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书中类似描述奕䜣多元化性格和立体化行为的事例很多，这样，作者紧紧按照辩证法思想，不露斧痕地塑造了一个多侧面和丰富多采的历史人物。

近代中国是风云变幻的时代，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下，人们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爱国与进步等优秀的思想品质与卖国媚外和反动等丑恶品质，有时竟然错位地连接。当奕䜣为在同文馆里开设天文算学课程而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虚心向西方学习，并奏请选派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们同举贡生监一起拜外籍教师研习自然科学时，他就遭到了占压倒多数的封建知识分子及顽固派群起攻击，获得了“鬼子六”的绰号。从此，他的许多进步改革措施都被列为媚外的证据。尽管他本人不顾这些污蔑诋毁，执着地推行自强新政，但所遭受的阻力是严重的。相反，那些闭目塞听，对西方事物深恶痛绝，高唱“华夏优越论”的愚昧不堪的顽固派，却总是以激烈的爱国姿态出现，招摇过市。例如他的七弟醇亲王奕譞对他的施政就经常表示不满和非难。洋人在北京重建天主教堂，教堂尖顶的高度超过了皇宫，某御史奏请对此事进行严重交涉。奕䜣说，教堂的尖顶上并不住人，高过皇宫没有什么妨碍，无须进行交涉。奕譞则大为不满，表现得他比乃兄更加“爱国”。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奕䜣为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创造近代化的有利条件，在各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以及国内上海、南京、镇江、芝罘、登州、广州等地陆续出现群众骚动的形势下，他力排众议，态度鲜明地支持曾国藩的办理方针，及时弹压排外事件，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作者认为，这是明智之举）。然而醇亲王奕譞却认为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他指使并包庇自己的爱将陈国瑞在天津鼓动青帮群众扩大事端，企图利用群众的义愤把外国人驱逐出中国。还上密折攻击奕䜣。这种对世界大势盲然无知的盲目排外行为，竟然被蒙上了堂而皇之的爱国大旗，以至百余年来奕譞的作法从未受到批评，而奕䜣等却受到责难。

作者在表现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善恶易位时，并不急于作出历史的裁判，谁是谁非，而是进一步发掘历史人物价值观念的分歧。指出：奕譞这样一些人是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荣辱观来看待事物，衡量一切的；而恭亲王奕䜣则实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他是用实用主义的利害观来指导外交等领域的施政方针的。然后，作者才提出自己的结论，认为如果按照奕譞等人的主张办理天津教案，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事件，就将提前三十年发生。在这里，爱国与反动错接、易位。

更有趣的是，极力倡导近代化的恭亲王奕䜣当政的时候，尽管积极扩充海防，购船造炮，筹建海军，却始终未能建成北洋海军，也没有成立海军部，甚至连铁路也没有建成。倒是在保守僵化的醇王奕譞当政时得到实现的。这是因为奕譞比奕䜣更了解趋奉慈禧太后的重要性。为了给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他奏请建立海军衙门，也许这也算作推进近代化吧；他在颐和园里添设水师轮船、电灯等近代化设施，让最高统治者首先享受到近代化的福祉。在这里，奕䜣的多谋善变与鲠介相连，而奕譞的僵化爽直却与趋奉将顺相通。前者极力推进近代化，却壮志未酬；后者对世界潮流颟顸无知，却造出一时繁荣。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错位。

性格的扭曲导致了个人功业的相反结果。

撰写史传，无疑要写传主的活动、功业；要写传主的历史地位。但如果只写这些“事迹”，还只是表层文章，还不是一部好的史传。一部好的史传应该写出传主的思想情绪、性格心态，要写出深层文章。大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奕䜣的这个层次，写他的志向、抱负、识见和遭遇，写他的欢乐和忧伤、顺境与逆境，因而使全书有思想，有深度和厚度，令人读来回肠荡气，引发深沉的思索，从中得到启迪和教育，的确不失为一部写得颇有特色的好书。

《恭亲王奕䜣大传》描述了传主生平的各个侧面，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近代改革家的形象。此外，书中的许多论断立意颇新，可为一家之言。至于这位改革家的形象塑造得是否牢固坚实，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书中颇具新意的论断是否经得起检验，能否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则有待于史学家的鉴别和评论。

（上接第31页）

⑫徐指徐世昌。

⑬沈云龙：《谈袁世凯》，《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第61—62页。

⑭《觉花寮杂记》卷1。

⑮李宗侗：《五大臣出洋与北京第一颗炸弹》，《传记文学》卷4，第4期。

⑯㉖胡思敬：《大盗窃国记》。

⑰胡思敬《审国病书》。

⑱铁良原是赞成立宪的，一九〇四年南下视察时曾多次与张謇研求宪法。一九〇五年入军机处后，又促成清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参见《张謇日记》、《张謇存稿》。

⑲《汇报》第9年，第51号。

⑳㉑《时报》1906年11月8日。

㉒《改订官制各大臣现象》，《汇报》第9年，第72号。

㉓《要闻》，《汇报》第9年，第92号。

㉕㉛㉝刘体智：《异辞录》。

㉗《要闻》，《汇报》第9年，第67号。

㉘《要闻》，《汇报》第9年，第73号。

㉙《各大臣对于改革官制之意见》，《时报》1906年9月30日。

㉚《枢府新谈》《汇报》第9年第84号。

㉜1907年6月27日《时报》载：“瞿于□报馆实有股份，组织之者为贵阳□氏，湘乡□氏，钱塘□氏也，故名之曰四集公司印字馆，谓瞿□□□四人集合而成也。闻有人密买通瞿之仆人及其幕友‘确得瞿与□报往来信札，查得真凭实据，然后下手，故折中第一条款即牵及朱氏，语语徵实，非有卖家奴为之和盘託出，断不能遽得真相也。”按“钱塘□氏，指汪康年，汪籍贯浙江钱塘（今杭州），“□报馆”者，实指《京报》馆也。

㉞《时报》1907年5月16日。